

平潭党史资料

中共平潭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平潭党史资料

第八辑

中共平潭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六日

主 编 丁陈兴

责任编辑 何可澎

编 辑 卢明 丁玉梅 林景闽

目 录

革命回忆录

1、军旅生涯片段回忆.....	林光楠(1)
2、往事追踪.....	林文敏(6)
3、南园旅社联络点	林光楠(16)
4、我的经历	陈孝义(21)
5、我所知道的东岭游击队	林厚基(26)
附：对《我所知道的东岭游击队》一文的补充.....	翁强吾(31)
6、回忆在东岭地区的日子里	刘维钧(32)
7、平潭地下党与省商学运	林光楠(40)

史事回顾

8、平潭县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各项政策工作的回顾	
.....	林文敏(49)
9、从平潭县的反右派斗争说开去	何可澎(52)

人物春秋

10、杨建福同志传略	叶承武(57)
11、我所知道的杨建福同志	林祖耀(65)
12、吴秉熙同志传略	何可澎(68)
13、刘贞辉院长传略	何可澎(78)
14、怀念郭可法同志.....	何可澎(91)

改革新篇

- 1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平潭的实践 何可澎(94)
16、改革开放后的平潭电信事业 丁玉梅(103)

研究与探讨

- 17、平潭地下党对 9.16 解放平潭战役的贡献 林光楠(106)
18、毛泽东与列宁 何可澎(115)
19、邓小平没有理论吗? 何可澎(128)

编 后

军旅生涯片段回忆

林光楠

1949年9月底参加福建军区第一期军政干校的，平潭只有我一人。十一月份，军政干校改为华东军大福建分校。训练科目中，每周有半天时间是军事形势报告会，是最受学员欢迎的。随着海南岛的解放，以及本校第二期扩招3000名会讲闽南话的台湾服务团，渡海作战话题又多了起来。有一天钟贤文副校长作报告，讲到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原理时，提到自己指挥的解放平潭海岛之战，能取得重大胜利，是平潭人民支援300条船和有觉悟船工，解决了渡海工具问题。登陆以后，平潭人民象山东、苏北老解放区人民一样，替解放军当向导。金门战斗失利，渡海工具没有解决，没有发动人民支前，是重要原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对平潭人民支前行为给予高度评价。

1950年预科快结业时，班长董滔（我是副班长），要我一起到中队部向指导员刘健坦白交待，他是邱清泉随从中校高级参谋，黄埔军校毕业。董滔到中队部交代时，还顾虑重重。刘健是三八式团级干部，对董滔坦白交代，给予鼓励表扬。这个消息轰动整个大队，副校长钟贤文也来看望董滔。董滔因到10中队探望他爱人，所以刘健就叫我到中队部汇报。我一进队部，指导员即向钟副校长介绍了我：他叫林光楠，是副班长，到军大时带来了壹枝好枪，会做思想工作，当董滔顾虑重重时，帮他打消顾虑，促使他坦白交代。钟贤文幽默地说：“我们‘十纵’（后改28军）在山东战场，淮海战场与邱清泉兵团长期交手，战打的很苦，最后在淮海战役，打死了邱清泉。想不到他的高参在十二中队被你们抓了俘虏！”刘健也笑着

说：“不能算俘虏，应算投诚起义！”在董滔未到，谈话过程，钟贤文了解我是平潭人时候，又引起了他的谈话兴趣。他问我认不认得吴兆英、林中长（还问到其他两三个名字）。我当时不好和他说和城工部关系，只说，这两个人和我都有亲戚关系。钟贤文又再次提到解放平潭问题：解放平潭能取得胜利，游击队当向导和提供的情报起了很大作用。打金门时，解放军条件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船，有觉悟船工占少数，所以失败了。他说：在 1949 年 6 月前，金门原来没有守军，8 月 31 日泉州解放后，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金门，才有 12000 守军。9 月中旬我们解放平潭后，如果带上解放平潭时 300 条船与船工，“宜将剩勇追穷寇！金门是很容易打下来的，金门的李良荣，比李天霞差远了！”我当时问了钟校长：“那为什么不带平潭支前船工打金门呢？”钟校长心情凝重的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要过多少年以后，才能说清楚。”

1950 年 5 月，军大预科结业，后转入本科学习。本科专业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保训班，是从全校各中队抽出 40 名表现好的到兵团保卫部受训，我被选入保训班学习，很受同学们羡慕。经过四个月培训结业，有半数以上学员要分配到打金门连队当兵锻炼，我们愉快地服从分配。

第一关被分配到 28 军 82 师。不知何故，与 82 师特别有缘。1949 年 9 月初，与高自立、谭兆鹏等六人（初中、高中同学，并一起接受地下党教育），也是到 82 师从戎。当时只有高自立等三名，因身体条件好，有专业特长的被接受。另外三个人，则被介绍到兵团军政干校参军。在师部，无意中碰到高自立，感到无比高兴。高自立说：“第一次打金门时，我在主攻团 244 团，全团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员没有船坐，被赶下了船，没有参加金门登陆。”并说：“年内要第二次登陆金门。现在全师一级战备，正紧张地进行‘全封闭复仇练兵’要受得了苦！要经受任何考验！”

后辗转被分配到 245 团二营六连九班。从团、营、连到排、班各级领导，认为是军大学员，下连参加金门战斗，都另眼看待，免不了都有一番鼓励。晚上班里召开迎新座谈会，并编入第一组战斗序列。

下连第二天，就参加了复仇练兵。在军大参加近一年军政训练，象校歌所唱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作风”。但在这里，除团结、严肃外，还存在愤恨、复仇、杀气腾腾的紧张气氛。

每天军事练兵前，首先唱“复仇歌”（是原来 82 师老政委李曼村写的 244 团团歌）“血的仇要报，要报，要报！”“血海深仇要报！”每个战士一唱起这首歌，就热血沸腾，同仇敌忾！

班、排、连都订有战备公约或计划，逐条检查战略公约，是每晚班务会都要进行的。记得九班当时订的是“十要”、“十不准”。

“十要”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苦练军事技术，提高战斗本领；要坚决打下金门，不怕牺牲；要刺刀见红，为牺牲同志报仇……。

“十不准”是：不准暴露攻金计划；不准自由主义；不准接触群众；不准贪生怕死；不准对现实不满；不准搞小团体……。“十要”“十不准”通过班务会，可以随时增减。班上有一个文娱骨干，有一天下午休息时拉胡琴娱乐，班长在班务会上提出，又增加“五不准”：“不准拉胡琴”“不准唱歌”“不准开玩笑”……。第一小组长，机枪射手徐国祥反对说：“不准开玩笑，象什么队伍！”班长最后总是强调说：“我们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让大家集中一切精力，保持旺盛的，饱满的战斗情绪，攻下金门，有些措施不合理，大家忍受吧！”

每周都有一、二次排、连、营大型集会。讲“古宁头”战死烈士英勇、壮烈事迹；讲全军覆没的沉痛教训。是最激动人心的，也是最悲痛的。28 军之史，把金门失利，作为最大失利，最大沉痛史，耻辱史记载下来。有一次，团政委根据金门战败教训，在一次干部会

议上，总结了四个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兵民是胜利之本；不能忘记渡海作战不能缺少渡海工具；不能忘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能忘记，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给大家教育很深。

1950年10月初，上级通知，每人只能保留一套内衣，一套军装，其他多余衣物、书本、笔记等杂物，都要处理掉。老兵们背后议论，二次攻金战斗快要发起了，这是“轻装上阵”，这件事难坏了我，衣物处理掉不要紧，把笔记、日记、资料、相片等处理掉，等于割掉我的肉，想了一个晚上对策：第二天下午游戏休息时间，把笔记、日记等资料，寄在曾当过小学教师的房东哥哥王先生那里。这件事被八班长看见了，就转告了我们班长。李班长随即找我讲话，我把过程、想法对他谈了以后，李就指出：你违反了“不准接触群众，不准泄密”的规定，我说，我笔记没有保密内容，我不愿意处理掉。班长说，这件事要反映到连部。过了一会儿，果然牛连长派通讯员叫我到连部。到连部路上，想起了245团干部、战士，都很崇拜钟贤文，很多人都认为，按钟贤文战斗方案打金门，或按钟贤文要求带平潭船队、船工打金门，早就把金门、台湾打下来了。所以一到连部，我就把钟贤文推了出来：“笔记本没有什么秘密内容，都是叶飞、钟贤文的军事、政治报告记录。以及学习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的笔记簿。相片钢笔是钟贤文送的纪念品。”牛连长问了一句：“钟师长送纪念品给你？”我说：“是啊！”谈话过程，连长态度算好，没有批评我泄密或违反纪律，却坚持要将笔记本烧掉，不能把物件寄在群众家里，允许少量的资料，照片个人保存。见连长态度和蔼，我也用平和的口气与其商量说：“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写点小文章，收集一些好资料。你看毛主席一篇‘论持久战’，军大曹教育长，就上了十次课。许多道理，对我们军人来说，有很好的教育指导作用！你真要处理掉，我就送给你，千万不能烧掉！”牛连长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又开说：“写文章好！你上次写的，贴在连队

墙报上关于‘五队’的归纳，大家都很喜欢看。连长还记得一个多月前这篇稿子，我心里一阵高兴。那时，准备二次攻金部队全军发扬军事民主，其中有一专题，用对比方法讨论平潭胜利，金门失利原因。我根据全连干部、战士说的：“平潭老百姓好，游击队好！船好！船工好！”归纳成，游击队参加解放平潭，起了“战斗队、运输队、宣传队、情报队、向导队的‘五队’作用（仿毛主席红军是宣传队……的写作模式）。我问连长：“游击队起了‘五队’作用，大家能不能接受？”连长说：“能够接受！”并引发了他认了一段愤愤不平的话：“部队解放平潭后，上级叫我们报了集体立功材料，也把游击队带上（请功），进军福建时，我们团开山、辟路，走在最前面。解放福州时，最难打的一次战斗，也是唯一的一次战斗，就是打下万寿桥（解放大桥）是我们245团打的。解放平潭草屿、塘屿和平潭南部，俘虏6000多人（占平潭俘虏数60%），也是245团打的。我们战绩，比“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大得多，可兵团领导说，打下金门再评功！……。”这时我和连长像在促膝谈心。就说：“笔记本、日记本就不要处理了吧！”连长却执拗的说：“轻装上阵，处理一切多余物件，是不能变的！”无意中，我迸出一句“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连长沉下脸来，严肃的说：“对，你是秀才！我是兵！但这个措施，是上级规定的。那个‘王先生’有一般历史问题，当教员还在审批中，你东西不能寄在他那里的！”说完，就叫孙副连长监督实施“轻装”，没有一点商量余地。还好孙副连长通情达理。只烧了四本笔记本，其他东西都保留下来了！

1999年10月

往事追踪

林文敏

一、二哥林志明之死

我大哥林斌参加革命活动时我才八九岁。我两个哥哥先后为革命而牺牲，大哥获得烈士的荣誉，可是二哥林志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评上，至今我仍感到遗憾。虽没有评上烈士，但他为革命而死的事迹不应让其泯灭。现将杨乃佑告诉我二哥死难情况，追记于后。

1943年夏，根据沿海突击队抗击日顽斗争的需要，周裕藩与林慕曾、林斌建立屿头两面政权的乡公所，为闽中沿海突击队转移活动，建立可靠的基地。

通过杨乃佑与平潭县长林荫的同学关系，设立屿头乡公所的申请报告获得批准。杨乃佑出任乡长，林斌任副乡长。于1944年1月1日两面政权的屿头乡公所便正式成立。6月杨乃佑调往松下以行医为掩护建联络点，吴聿静推荐张奇民接任乡长。

屿头乡公所成立后，以杨乃良负责民政，林志明为文书，并派林斌从惠安带回来的战友骆连祺和堂弟林木森为递步哨。这样屿头乡公所的实权便掌握在林斌手里，便于配合原闽中党安排在屿头活动的吴聿静开展革命工作。因之，引起林荫的警觉。布置驻苏澳的自卫中队长，密切注意林斌的行动。

当年12月，林志明奉林斌之命回大岛县城了解情况，到达苏澳镇土库村高名枢处。平潭县长林荫得悉，派出几个自卫队员化装后到土库村，叫一个志明认识的到高名枢家骗志明一起到高山

寺看戏。志明不知是敌人派来的，便同他们一起到高山寺。走到路上，几个敌人蜂拥而出，将志明捆绑起来，并把其嘴用布塞紧，不让其喊叫出声，连推带拉把志明抓到最僻静的地方金岐澳的石砾上面，然后把志明的衣服剥下，把他勒死后推到石砾外海中，沉尸灭迹。

高名枢见志明去高山寺看戏当晚未回，便感到蹊跷，于是次晨便很早涉海赶汐步行四十里赶到我家，不见志明回到家里，便将志明昨晚被人叫去看戏未回的情况如实告诉我父母。我父母当即惊恐不已，便差遣我的几位堂兄，同高名枢一起到土库村找寻林志明的下落。可是连续在苏澳各村找了六天，始终不见志明踪影。到了第七天又分头到苏澳镇西部各村查找。找到金岐村人，才听到村民说：石砾外有一尸体不知何人？高名枢等获讯息后，立即跑到石砾外找寻和验看尸体。由于志明尸体在海里浸泡了六天六夜，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幸是隆冬季节，尸体还未腐烂。于是大家便把紧扎在颈上的衣服解下来，才认定这个尸体确是志明。可是人既死不能复生，无可奈何，大家饱含悲痛心情，到苏澳镇上买了一口棺材。把志明的尸体收殓入棺，雇人抬到土库村附近高山寺下边的小山丘处挖了墓穴。把志明的尸体掩埋在那里，至今仍在。

这些具体寻找过程，我亲耳听到高名枢告诉我父母的。当时，给我幼小心灵的震撼，与我父母所受到的打击，此情此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如在眼前。

二、营救林斌

1947年，平潭“码头事件”发生后，县长林荫下令查捕该事件的策划者和参与人。获此讯息后，几位“码头事件”的组织领导人和参与行动的同志，根据地下党上级的指示，撤离平潭。

当时参与码头事件的地下党员陈孝仁同志在被缉捕之列。

有一天傍晚，他便化装向潭南转移。我见一位陌生的壮年人，身穿棕衣头戴竹笠，趁阴天小雨的天气，孤身一人来到我家找长兄林斌，态度严肃，神情镇定。此时，林斌刚好在家，两人一见面没有说几句话，便点头会意地立即离开我家，一同走到比较偏静的林日润家围墙后面。我好奇地跟着到门口，不一会陌生人便与林斌分手，一个人向西朝赤土山村方向的小路走去。后来我才知道这陌生人便是陈孝仁同志。听说他离我家由任厝村的亲戚设法船只把他运到福清去。

在陈孝仁逃经我家与林斌密商离开后，林斌即把他从闽南带回的一支大号左轮和一支小曲五手枪，转移和密存起来。同时把家里所有外地朋友寄来的书信及有关材料全部清理烧掉，家里不留一点会引起敌人注意和怀疑的痕迹，也准备离开平潭。

不料敌人抢先一步，于1947年农历4月的一天晚上，警官陈天福(解放后镇压)带领一队便衣警察，秘密直入美楼村，把我家团团包围。几个敌人破门而入我那一间既矮小又狭窄的民房，如狼似虎，大声吆喝，直闯后房，便对林斌说：“林县长请你去县城一趟”。我哥哥不与分辨，穿了一套洁净的中山装，被几个警察推拉到屋外去。当敌人破门入室时，我一家人惊得魂飞魄散，我穿了衣服坐在床铺上发呆。林斌被抓出去，几个警察便翻箱倒柜进行全面搜查。其目的是想搜查出我家中有无外人藏匿，有无林斌从事共产党活动的证据，有无可取的浮财。可是我父亲是一个靠舌耕糊口的穷儒，那里有什么浮财可作“下水”。敌人气愤得很，林斌被抓到林日润屋前时，便用卜克枪管朝他的胸前和背部连打数下，面颊下面还被枪管打破一孔，鲜血直淌在林斌的衣裤上(出狱后斑斑血迹犹在)。就这样把林斌押到县警察局关进监狱。当时敌人还扬言要把林斌运到竹屿港中填海。

我哥哥被抓，我的母亲、嫂嫂和两个小侄女都惊得嚎啕大哭。次日才知那天晚上同时被抓的还有本村的林光富。在抄家时，我父亲因手头无钱，没有送“外快”给这些警察，于是那些警察便把中用的衣物拿走了，连母亲床上的一条旧毛毯和父亲的一架眼镜也拿走了。

为了营救我哥，次日父亲和母亲都赶到县城，托熟人了解情况，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时期，无钱运作是不能奏效的。于是，在求借无门的情况下，我父亲无可奈何只得把祖遗的二亩土地，典卖给龟仔山村人，把卖地的钱全部拿到县城去托人疏通。

由于林斌被捕后，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地下党员身份，严守党的机密，而且在抓捕抄家搜查中，又没有获得林斌从事共产党活动的任何证据，更没有抓到有“码头事件”直接参与的人员藏匿我家，因此，一时无法处置林斌。

有点钱还不行，还得找人疏通。派我二姐夫高名枢到长乐松下把林斌被捕情况如实告知我大姐夫杨乃佑。杨乃佑与林荫乃同学关系，得此讯息后，便即乘船赶来平潭，向林荫陈说林斌在屿头岛担任过副乡长（两面政权乡办公所），半年卸任后，一直从事商业活动，要求林荫把他释放。林荫在得不到林斌进行共产党地下革命活动证据的情况下，更没有获得林斌参与“码头事件”的证据，而且又曾任过屿头乡副乡长，所以只好顺水推舟卖个面子给杨乃佑，答应放人。

林斌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弃工从戎，报名参加警官训练班训练，与此时担任平潭县警察局长的韩力方是警训班的同学关系，在抓到林斌后，见他从容说明情况进行陈词辩解，又没有取得他进行共产党活动和“码头事件”的任何真凭实据，当然也不忍加害。

于是林荫与韩力方商定后，便把林斌关押一星期后，予以释放

回家。担保人当然是杨乃佑。杨乃佑已知林斌投身地下革命活动,为了营救林斌,再大的风险他也得承担。

林斌拖着胸背遭打重伤的身体回到美楼家中。这时我一家人才把压在心头的重负卸下。所有的亲人才松了一口气。回家后,林斌便把被敌抓捕对他进行审问有关情况的过程告诉我父亲。这次被捕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他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和藏匿“码头事件”的有关同志。这一次被捕抄家后,才引起林斌的高度注意和警惕,才明白自己已被敌人列入打击的对象,稍一疏忽,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

经过一星期的治疗,伤痛有稍减,毅然决定离开平潭到内陆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以策安全。父亲担心在平潭不安全表示赞同。当他离家前写了一封信,命我悄悄送到城关南街同康药店老板许经义收转给另一位地下党同志。在一天傍晚时分,带着简单的行装,拖着尚未完全治愈的伤体,辞别父亲妻儿,昂然走向村西小路朝赤土山村方向走去。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家过,谁也想不到,会是诀别。更想不到他不死在敌人手里,而死在自己的同志手里。1949年春因城工部事件被错杀于长乐。

林斌被敌抓捕,造成二亩土地卖掉,家中衣物又被敌人洗劫一空。这时我在赤土山小学念四年级。由于此变故,也就无法继续上学了。

三、吉钓受命

大姐夫杨乃佑,见我父亲家庭困难,推荐他到吉钓岛从教。父亲便把家中租的耕种土地,交给我的嫂嫂(林斌妻子)去耕种。

1948年春节过后,父亲林光照带我去吉钓岛学校作伴,同时也念一些书。

学校设在吉钓村的祠堂里。该村有上百户人家，主要从事渔民及运输业。水源缺乏，岛上全是望天田，学生只有三十多人。

长兄林斌从 47 年春离家，便投奔到林白同志（后任城工部副部长）处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去后数日只从福州寄回一封信告安，信封上写“福州集友银行”寄，以后就没有寄信回来。父亲日夜都在担心他的安全。

1948 年 4 月中旬的一天，他与福长平工委学委书记张纬荣同志回平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先到长乐松下地下老交通站杨乃佑中药铺，了解一些有关情况。得知我父亲与我在吉钓岛。于是他俩与杨商量后，决定离松下到吉钓岛。

他们突然到此，父亲和我惊喜异常。父子别后一年多才得在这小岛上见面，感到意外。

这时林斌便对张纬荣同志介绍我父亲的情况。张知道我父亲一贯支持林斌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感到很钦佩。

这时，张纬荣同志便对林斌提出说，现在你父亲在这里教书，我们可以把学校作为联络点，这里离松下近，到屿头岛也不远，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又见我也在学校伴父亲，便拉我的手到他身边，问我：“你敢不敢去秘密送信”。我答他说：“敢”。他见我勇敢的表情，很高兴。便对林斌说：“可以叫你弟作地下交通员，他年纪小，不会引人注意，可靠安全”。林斌很赞同纬荣同志的意见，便鼓励我大胆去做地下交通员工作，再三要求我要保守秘密，认真完成地下交通任务。这时他告诉我上级领导是曾镜冰、林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但交代不许对任何人说。并讲了一则兄妹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给我听。我听后鼓舞很大，增强信心。这时，我完全明白长兄林斌几年来一直是在秘密进行地下革命斗争。林斌当即提出因工作需要当晚要到屿头去，要求父亲去找二、三个可以信得过的村民用船把他们运送到屿头岛去。父亲见说也

不敢挽留。于是便悄悄去到林道光(又名占早)家,请他叫林顺来、林尾妹配合,设法一条小船把客人运送到屿头田下去,道光等马上行动。当晚父亲和我送纬荣、林斌两人登船,道光等三人已安排好小船,目送小船远去,才返回学校。

次日早上,道光、顺来便来到学校告诉父亲“客人”已安全运送到田下,请他放心。这三人以后便成为吉钓岛水上可靠的地下交通员。早饭后,我便乘小渡船到松下把林斌离开前写的信送给杨乃佑。这是我第一次完成的地下传信任务。

在1948年的一年中,张纬荣(学委书记)、徐兴祖(东岭游击队副队长)、林斌和其他地下党同志,经长乐松下杨乃佑中药铺到吉钓岛先后有六次。其中有4次再到屿头岛,二次到大练岛渔限村,然后回平潭大岛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来时最多两人,有时一人。有时白天来,有时晚上来。在吉钓学校都没有过夜。运送出岛的都是道光、顺来、尾妹三人负责,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运送中都改装成渔民打扮,所以都保证做到可靠安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问题。

从1948年4月开始到年末,我多次奉命到松下杨乃佑、大祉林大伟、小祉林奇俊、前连益购弟、梁厝梁宝玉、平潭土库高名枢、一埠翁其恭、城关同康药店等接头户处传送口信、书信和《林荫、郑淑平朋比为奸》的小册子,以及“火炬”小报和短枪等。接受任务有时在吉钓岛,有时在松下杨乃佑处。我便把随带东西随便放在不显眼的船舱边,乘客不会注意。从苏澳靠岸,当时没有码头,靠在大礧上,有时潮水退得很低,下船时更困难。从苏澳步行到土库村高名枢接头户处,住了一夜,次日要趁退潮时从海滩小路经芦洋埔、霞屿、东屿的海滩小路到县城,再到一埠,然后回老家美楼村。一趟要步行四十华里到五十华里。特别秋冬季节从芦洋埔穿过,被风沙撒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而且脸被沙撒得刺痛,走两头海滩烂泥路时,有时脚会被海蛎壳划破,鲜血直流,痛得不能走。遇上天气